

# 书 品

(2007年第2辑)

徐俊 主编

中华书局

2007

---

## 学林忆往

- 辛德勇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3
- 顾 青 追忆黄永年先生 9
- 傅璇琮 深受感召  
——记叶圣陶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办两件事 13

## 序跋录

- 萧启庆 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自序 29

## 专题书评

- 孙家红 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 50

## 评书论学

- 徐有富 走近国学大师  
——读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55
- 赵 益 天才为什么成群的来?  
——读敬堂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有感 63
- 胡晓明 执大象 天下往  
——《选堂序跋集》书后 68
- 方广铝 读《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 73
- 梁 彦 书缘清话话访书  
——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有感 77

# 王昆吾 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

——略谈《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学术背景和意义 82

## 编撰摭谈

祁龙威 《张謇日记》笺注后记 91

## 读书札记

杨晓春 《建康实录》点校本商正一则 93

##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8

聂崇岐先生《校勘宋史凡例》

## 书苑撷英

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 林英  
《唐代拂菻丛说》 湛如《净法与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

## 新书预告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61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 94

---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电话:(010)6345822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 辛德勇

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到过几本中国古代文史书籍,除了因旧时村学通行而在市面上还广泛流通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只翻阅过一本近人林大椿编纂的《唐五代词》,浏览过《史记》的大部分本纪和列传,也看到过一两本《汉书》的人物列传。1977年考上大学,被从文科考生当中错招到理科念书。那时,不仅根本没有转系调换专业一说,学校甚至还满校园张贴告示,严禁像我这样缺乏“专业思想”的学生,私自偷听其他科系的课程。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不甘心就范,也只能在课下自己跑到图书馆去读些想看的书,但既缺乏相应的预备知识,又没有老师指点,只能是顺手胡乱翻检,完全没有头绪。后来能够找到初入书山的路径,都仰赖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点拨教诲。

本科毕业后我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本来都是随从史念海先生,研治历史地理学。业师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学术泰斗,但面对像我这样懵然无知的门外汉,具体怎样来引入文史研究领域,史念海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并且事务繁忙,顾不上对所有事情都一一指教;有些基础工作,是请黄永年先生来协助完成,阅读文史书籍,就是如此。

黄永年先生开设有目录学课程,学校里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来选修,教室里座无虚席。这里面有很多同学,基础比我要好,了解目录学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些人也了解黄永

年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精深造诣,我却只是按照导师史念海先生的强制性要求,懵懵然走入黄永年先生的课堂,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才逐渐理解到学习这门知识的重要性。

根据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项特征,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史籍的史料价值,是学习目录学知识的主要用途,这也是目录学课程所要讲述的核心内容。这些知识,说起来很重要,初学起来却十分乏味,若非遇有良师引导入门,很多人对此都是望而生厌,以至终生无法得其要领。

在并世学者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人在这方面具有比先生更为通博的学识,但至少很难有人会做到像先生那样,将这门看似枯燥不堪的学问,讲得如此妙趣横生,满堂生彩。先生讲述目录学知识,能够吸引学生的地方,语言诙谐幽默,其实还只是表面原因。在大学的讲台上,从来也不缺乏语言生动的教员,能够讲成时下万众尊崇的明星学者,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其中颇有一些“名嘴”,很难持续获得学生的敬重,原因即在于缺乏足够的深度。假若仅仅是就书目而论书,目录学课程难免会被讲成余嘉锡先生痛加贬斥的所谓“书衣之学”。先生讲述这些内容,则有两项明显与此不同的特征,即一是重视将每一具体的文献,都置之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来阐述其内容和性质;二是注重揭示各种历史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这样来讲述目录学知识,想法本来很平常,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难得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要做都能够做到。

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包罗万象,清楚每一部书在学术源流中的位置,需要全面了解古代学术文化史,这已经很不容易做到;再要讲出这些典籍在当代各个文史学术领域内的史料价值,又需要普遍了解这些领域所要研究的对象和主要问题,包括有重要意义的前沿进展,其对讲授者学术视野和能力的考验,可想而知。黄永年先生讲授目录学,能够得到各个专业学生普遍持久的敬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从事专业研究

所终生需要的基础知识,从而引领我们找到步入学术殿堂的正确途径。

在掌握相关的目录学基本知识之后,黄永年先生特别强调,一个人能否通过研读史料而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再通过分析相关史料来很好地解决问题,除了个人的天分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每个人能否静下心来细心读书。先生文献学知识广博,熟悉各种史料,而且自己还收藏有很多稀见善本古书,分析问题时运用各类典籍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却一贯主张,研究历史问题,要以读懂读好常基本典籍为主,特别强调要花大力气读正史。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从史料入手,首先是要重视悉心研读基本史料,而不是刻意找寻生僻新鲜乃至怪异离奇的史料;或是读书不分轻重主次,泛滥无所归依,这是先生在讲课中向我们传授的治学要诀。像历代正史这一类传世史料,虽然叠经披览,但仍蕴涵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信息,有待研究者识别利用。在这当中,有些史料价值,是随着研究者视角的变化而不断显现出来的;有些是随着相关研究的进展而被重新认识到的;还有很多,则主要是由于前人读书不够仔细而被埋没,或者被错误理解,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想充分利用这些史料,一个最简单但也最为可靠的办法,就是仔细读书,尤其是留意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先生研治隋唐和北朝历史的重要创见,就大多都是这样细心读书的结果。先生曾经几次和我谈过,他之所以能够针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许多不同看法,就是缘于在陈寅恪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更用心地细读两《唐书》等正史,以及《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这样一些基本史料。

黄永年先生治学强调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从细微的现象和具体的史实入手切入问题,同时也强调分析和论述历史问题,眼光一定要开阔,手段要尽可能丰富,先生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目录学知识,其中一项重要目的,就是用以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手段,在这样一个侧面或者说是在基本点上,形成比较全面的研究素养。每一个人的研究都会有所侧重,但先生主张,一个研究者,不管主

要从事哪一领域的研究,不论是某一时期的断代史,还是某一部门的专门史,都要首先熟悉整个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同时也都要尽可能全面了解所有各类文献,然后才是与每个人具体专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专业文献”。

通过跟随先生学习目录学课程,我对各类文献史料逐渐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遵循先生指教的这些读书路径,我才逐渐具备了起码的文史研究基础。虽然真正领会和掌握的目录学知识,直到现在也还极为肤浅,却已经在尝试研究问题时,得到诸多收益。

黄永年先生讲授的另外一门有关历史文献的基础课程,是古籍版本学。当年在学校上这门课,由于自己基础较差,为多拿出一些时间来学习目录学知识和历史地理专业知识,只听了两堂课,就私自溜走开了小差。真正向先生学习版本学知识,已经是调到北京工作、开始买旧书以后的事情。

孔子有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同目录学知识一样,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知识,也完全出于自学。所不同的是,先生的目录学知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而他自学版本学知识,除了阅读相关书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在旧书铺里购买旧本古籍。由于先生治学强调读常见书,购买古书,并不是为写文章寻求稀僻史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文玩而已。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乐在其中的赏玩,先生才无师自通,掌握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同先生的这种经历多少有些相像,我能够在博士毕业工作后还提起兴趣跟从先生学习一些版本学知识,首先也是因为想买旧书的缘故。

先生买旧书,包括的门类范围虽然很宽泛,但在性质上都是侧重“正经正史”性的基本典籍,这正与先生读书的侧重点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虽说先生宣称买旧书只是一种业余雅好,实际上还是寸步不离其治学的旨趣。其实也正是通过经常摩挲翻阅这些典籍,先生才对历史文献具备了大多数学人难以企及的广泛而又具

体的认识。轮到我买旧书的时候,这类堂堂正正的基本典籍,在旧书店里已经很难遇到有特色的版本,但我还是遵从先生指教的路数,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到一些富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典籍。譬如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的乾隆原刻本、陈澧《东塾读书记》的最早刻本,就都是以极为平常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便宜的价格,从旧书店中几乎无人过问的书堆里细心搜寻到手,并得到先生的嘉许。不过,由于这类书现在实在太过稀少,我买旧书,更多地还是在遵从先生将消遣与治学结合起来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去关注那些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文献。这一点虽然与先生购书的重点,略微有所不同,但我一直恪守师训,绝不以利用这些孤密罕传的生僻文献,作为治学的重点,而是注重在传世基本典籍的源流背景下来认识这些罕见文献的独特价值。

古刻旧本,由于传世稀少,其中有一部分书,很早就具有文物性质,而其文物性愈高,价格愈贵,学人也就愈难购藏。身为一介书生,黄永年先生向我传授他的切身体会说,买旧书千万不要与人争强斗胜,花大价钱买旧书,并没有太大意思;寻觅旧书很大一个乐趣,就是在常人不注意的书籍当中,发现有价值的好书。清人学术著作,过去不受古董家注意,常人也很难认识其价值,价格相对比较低廉,因而成为黄永年先生藏书当中颇有特色的一项内容。先生对清代学术之熟悉,如数家珍,在研究中引证清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信手拈来,毫不花费力气,我想和他这方面丰富的收藏应当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自己也正是在如法行事购买一些清人学术著作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和认识,对我研究学术问题,给予很大帮助。

按照我的理解,黄永年先生虽然说买旧书主要是出于赏玩的目的,但这种赏玩是以他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作为前提条件的,即这种赏玩更多地是着眼于特定学术内容书籍的版刻,相对来说,多数藏书家首先看重的版刻形式,在先生这里应居于稍次要一些的层次。譬如先生基本不收藏明代的朱墨套印本,就是由于这类书大

多内容太过平常而且校勘质量往往比较低下。我开始买旧书的时候,北京书肆上这类明末朱墨套印本,价钱还不算很贵,我还能够对付着买上一两部。有一次在旧书店里陪侍先生买书,我指着一部凌家或是闵家的朱墨套印本询问先生说,这书刻得很漂亮,我是不是可以买一部留下把玩?先生断然批评说:“辛德勇,你是念书人。过去正经念书人的书架上,要是摆上这样的套印本,是很为人不耻的,所以你不要买这样的书。”显而易见,先生购买收藏古籍,纯粹是念书人的路数,他是赏玩念书人关注的书籍。屈指数算,我在北京逛旧书店买古书,也有十五个年头了,至今篋中仍未存有一部朱墨套印本书籍(套印历史地图除外),就是因为老老实实在地依循着先生走过的轨辙。

先生从年纪很轻时就开始买旧书,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委托友人杨成凯先生,在北京代买过一部书籍,但他多年来一直是精挑细选,只撷取很少一小部分精品,从未放手滥收,因此,藏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在常年徜徉于旧书店中挑选书籍的过程中,经手经眼无数古籍,这必定会大大丰富先生的文献学知识。所以,虽说先生买旧书的直接动机是出自赏玩,但先生的古籍文献目录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娱自乐性学人消遣的基础之上。在先生的指点下买旧书,使我对此深有感触。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不仅是研治版本目录之学,黄永年先生读所有的书,做所有的研究,首先都是出自他求知好奇的性情,有真性情,也才能做好真学问。

# 追忆黄永年先生

● 顾 青

黄永年先生走了。

当我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正在外地出差。深夜，我一人枯坐在宾馆房间里，守着电话机。

自从黄先生过完八十大寿之后，就很少出门了。这两年里，每隔两三个星期，黄先生总会给我来个电话。这电话通常是在晚上11点之后，有时甚至在12点。一声“顾青同志”，然后就天南海北地聊天，中华书局最近有什么新书呀，学界有什么新闻呀，年轻时求学治学的一些往事呀，对时政的一些感想评论呀……最后，先生往往会这样结束通话：“给我寄点儿书吧。我现在走不动了，学问也做不成了，只能看看闲书了。”语气中透着寂寞和无奈，还有些许自嘲。

我第一次见到黄永年先生，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读书的时候。当时，专业课的讲课老师都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版本学请来的就是黄先生。先生个子不高，戴着黑边眼镜，笑起来慈眉善目的，嘴角的皱纹却愈发深刻，一讲起课来便眉飞色舞，满面生春。我至今记得先生在课堂上的“夸口”：“我不是吹牛，凡是重要典籍的主要版本，我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那份自信，还带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与骄傲，就如同孩子向同伴夸耀自己的宝贝。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是真的藏有宝贝的。我曾问他，家藏了多少善本？先生哈哈一笑：“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是不足为外人道

也!”

黄先生操浓重江阴口音的普通话，讲课嗓门挺大，用词用句极富个性色彩，坦率直白，抑扬顿挫。凡是提及好本子，先生会说：“这可是大善本啊！”但因为口音，“大善本”会念成“大蒜本”。讲明代善本特点，先生会说：“记得啊，黑口白绵纸。”“黑”、“白”两字都念成入声，生动极了。

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1986年夏天，我们班去西部考察实习，终点站是敦煌。从北京出发，一路到了西安。大概是旅行费用不足，学校就专门汇了一笔钱给黄先生，班主任派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取钱，据说有好几万元，着实让我们紧张了一回，生怕出意外。我们到了先生家，一起说话聊天。临走前，先生问：“你们知道我把钱放在哪里么？”我当时心想：这笔巨款总该锁起来吧。最后，先生指着书柜边墙角方凳上的一个军用绿挎包：“就在那里。最值钱的东西就要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谁也不会注意！”黄先生一脸得意。

我从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当时书局正准备整理《西游记》。请谁整理呢？傅璇琮、许逸民先生决定请黄永年先生来承担。我当时直纳闷儿，只知道黄先生是唐史专家、版本学家，怎么会做小说研究呢？后来，先生告诉我：“我从小就崇拜此公啊！”把孙猴子称为“此公”，我还从未听到第二位学者这么说过。作为责编，我向他建议，用明世德堂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先生没有表态，而是把中华书局藏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中的几种《西游记》版本全部借走，详作校勘。大半年之后，黄先生来信说，经过公子黄寿成的校勘，他认为清初的《西游证道书》才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真正成熟的本子，由此决定以它为底本。为这部新整理本，先生写了3万多字的长篇前言，对《西游记》的成书过程、版本流传和《证道书》本的地位做出极为精彩的论述。那考证的严谨绵密、论述的精彩精到，令人折服。当时初读时，我的感觉是震惊。后来我把这个读后感告诉先生时，他哈哈一笑：“这可是我真刀真枪写

出来的。”“真刀真枪”，又是典型的黄氏语言。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黄先生的自选集《文史探微》中，可见他对此文的珍视。

黄先生每年都会来北京，无论开会、讲学，都会专程到中华书局，与新老朋友见面，所以每年都能见到他。先生十分健谈，说起话来不徐不疾，却总是滔滔不绝，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真知灼见层出不穷，听来或振聋发聩，或如沐春风。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在脑中闪现：

谈治学，黄先生说：做学问，得出的结论要符合常理，符合实际，别弄得连自己都不相信。

谈家谱，黄先生说：家谱不敢全信的。我小时候就见过有人挑着担子去大户人家帮助修家谱，姓刘的就说祖先是刘邦，姓陆的就说是陆秀夫的后人。信不得的！

谈到自己当右派，黄先生说：那些人真是瞎了眼，让我这个右派到图书馆去改造。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让我去，我正好有机会读书！

谈到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黄先生说：我在“文革”中挑河泥差点儿丢了小命，现在却当上了人大代表，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国歌一响，我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老子也有今天！

……

去年8月，我跟黄先生提出，请他写一本自传。他丰富的人生经验、满腹的学问和掌故、精彩叠出的识见，都是多么珍贵的史料啊！但先生说：“我已经写不动了。”我想到“口述历史”的方式，想请他讲述出来。先生说：“我试过的，可是一个人干讲没意思，这要有人听，能交流，才讲得出来啊！”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出差去西安，多待几天，和先生边聊边录，整理出来，再配上他的照片、书法、印章，是一本多精彩的书啊！可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先生已经走了。

去年9月，中华书局的年轻编辑对我说，想编一本黄永年先生有关唐史的文章选本，供初学唐史的学生使用。我当即与先生商

量,他一口答应,并亲自拟定了选目,定名《唐史十二讲》,列入中华书局“专题课”系列图书中。此后,先生在电话中多次说:“这大概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我年纪大了,钱和名都没有意思了,只想把书出好,少一点错,不要误人子弟啊!”可是,这本书还在编校过程中,先生已经走了。古人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为什么不早做安排呢?这份自责与遗憾,压在心头,那么沉,那么重……

有时,夜深人静时,我守在电话机旁,真希望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话筒中又能传出先生那熟悉的声音。我想说:“黄先生,最近中华又出了好多新书,我给您寄去啊!”现在,我该往哪儿寄呢?

---

### · 书苑撷英 ·

《净法与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湛如著,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出版,定价56元。

本书是研究印度早期佛教律制与信仰的学术专著,分早期佛教净法研究及早期佛塔信仰研究两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讨论四大广说、五净法、七净法、十事非法及衣食等净法问题,对净法的产生及其流变进行全面研究,十事非法与衣食净法是关注的重点,并认为十事非法在上座部枝末分裂以前即已出现,其内容基本反映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等根本部派的律制观点。通过研究,认为净法的出现无疑是具体学处在执行过程中的变通方法,这种变通缓解了戒条的僵持与尴尬,使处于浮动状态中的条文得以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也使僧伽制度的原则得到体现。净法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食物与衣服,而这两点正是律制的核心部分之一。部派之间对净法的理解存在着显著差异,将相关的差异与具体的条文进行综括研究,是理解部派分歧的主要途径。第二部分主要以早期佛教的佛塔信仰为重点,以律藏、碑铭及初期大乘经典中的资料为中心,对佛塔信仰与枝提的关联、过去佛塔信仰、辟支佛塔信仰、佛塔的供具、佛塔的图象学及佛塔的信仰功德等进行全面研究。作者认为佛塔信仰在古印度传统习俗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佛教的信仰形态之一。伴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塔信仰也日渐成为理解部派佛教的途径之一,并对大乘佛教的产生给予了一定影响。

(李晨光)

# 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自序

● 萧启庆

## 经 历

我的习史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 （一）台大植根

我进入台大历史系是在 1955 年秋天，那时正是历史系的第一盛世，老师多为来自大陆上重要学府的著名学者，身教言传使我受益匪浅，我的史学基础便是在大学时代奠立的。

台大诸师中，姚师从吾（1894～1970）对我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从吾师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其后长期负笈德国，在学术上深受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汉姆（E. Bernheim）之影响。归国后，结合兰克史学与乾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成为我国现代辽金元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 年后更将辽金元史研究移植于台湾，一方面主持台大历史系辽金元史研究室凡二十年，另一方面倡议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及宋史研究会，倡导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语文之研究，遂使辽金元史成为 1950 及 60 年代台湾史学界的一门显学。

我在大二、大三时选修了从吾师的《辽金元史》与《东北史专题研究》。在这两门课程中，初次接触到北亚游牧民族与征服王朝的历史，开始体认到在中国史乃至整个亚洲史上，北亚游牧民族与中

原农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如辽、金、元、清更与汉族王朝也有相同的影响。过去的汉族中心观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多元性，这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严重缺失，有待弥补。

当时报考研究所需呈交学士论文，我在从吾师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由于年少喜好卖弄风雅，替论文取了一个典雅而令人费解的题目：《忽必烈潜邸旧侣考》。题目中所谓“潜邸旧侣”乃是指忽必烈即位前的顾问。这篇论文对忽必烈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转化为以中原为重心的元朝之由来及过程，尤其是汉族士人在此转化过程中的贡献作了详明的考述。后来申请哈佛奖学金时曾附上此一论文，杨师联陞(莲生)(1914~1990)在对从吾师的推荐函所作回信中提到对我两篇习作的印象，“两文俱甚坚实，足见学有根底”，“对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亦颇注意，审查哈佛大学奖学金申请书时，自当特为注意”，我之获得到哈佛求学之机会或许与这篇最早的习作不无关联。

1959年秋，我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仍然追随从吾师研习蒙元史。那时历史所开设了满、蒙文课程，蒙文是由札奇斯钦师讲授，斯钦师出身蒙古喀喇钦部，早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系，并曾在日本进修，精通蒙、日、英文。虽仅在来台后才开始治史，但不久即成为享誉国际的蒙古史家。他的蒙文班开始时有同学七八人，最后却剩下我一人。每次上课都是师徒二人面面对，负担殊为沉重，但也因而从斯钦师学到不少蒙古语文与历史的独门知识。

1960年代初是台湾学术界初露生机的时代，也是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的黄金时代。那时长科会(即后来的国科会)初设，从吾师膺任讲座教授，同时亦为东亚学术委员会主持研究计划，手头资源丰富，显得意气风发。陶晋生与李敖二兄方自军中归来，成为从吾师的专任助理，供职图书馆的王民信兄与我则是兼任助理，而王德毅兄时任历史系助教，也从旁协助从吾师，于是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我在其中颇得师长教诲之益与友朋切磋之乐。

我于1963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西域人”乃指元代所谓色目人。此一论文自政治史的观点,对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时代西域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响作了较详尽的探讨,以彰显蒙元时代政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论文口试通过后,从吾师曾赐函述其对此一论文感想。由于当时我即将赴美留学,从吾师在信中又说了不少勸勉的话。他的厚望更坚定了我研习蒙元史的决心。

## (二)留美深造

1963年9月,我到了哈佛,开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哈佛六载,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在校期间,除了修习史学、语言及社会科学等一般课程外,主要是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895)及杨联陞等两位先生。莲生师以博习多闻知名于国际汉学界,其治学能大处着眼,细处下手,即是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与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他的著作给予我治史必须宏观与微观兼顾的启示。

柯立夫师则是我在哈佛接触最多而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他是一位传统学者,也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绅士。自学术言之,立夫师师承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伯希和是20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也是举世公认的语文(philology)学派的大师。立夫师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一生主要精力贯注于三项工作:(1)《蒙古秘史》的重构与译注,(2)元代汉、蒙文合璧碑的译注,(3)《元史》的译注。其中第三项于其生前未能完成,而第一、二项则对蒙元史的探讨及早期蒙古语文之重构作出重大贡献。学界公认他是美国蒙古学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汉学及东方学学风丕变,社会科学派势力日升,立夫师却固守语文考证之阵地,不免日益孤立,却是终身不悔。而在为人方面,立夫师亦可说是战后美国社会中的“今之古人”。他终身未娶,始终独居,在生活上力求维持新英格兰的传统方式。晚年独居于一个广达百余亩的农